

【转载】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圆桌·对话）

社会是曲折发展的，但是倒退的时候不要以为自己在前进，否则就会迷失方向-文字稿记录

03:32正式开始 温铁军发言

11:29俄罗斯经济学家-亚历山大发言

51:33清华人文社科高等研究所-汪晖

01:07:60温铁军补充

01:17:05萨米尔发言

01:24:02亚历山大补充

01:38:45萨米尔发言

完整版：

03:32正式开始

温铁军：大家下午好。社会主义并不是典型的中国语言，1919年以前，我们对这些“主义”一无所知，这些词大多是从西方语言中传入，并经由日语翻译过来的，此前中文中只有“大同社会”，或者类似的理论，但不完全是社会主义。所以这一次，当我们开始谈论的时候，我想谈一谈“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我认为，也许我们应该把我的话题改为“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

我刚才提到所有这些主义，国家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有这些“主义”这些“化”，最初都不是从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觉得很难用这些主义来描述真实的中国。

我们的任务就是向大家阐述什么是真实的中国，尤其是向外国人，也不仅是对外国人，也是对中国自己，如果他们只学习西方中心的哲学和社会科学，他们也无法理解什么是真实的中国。所以我先给你们几个数据，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数据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说的是，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首先，如果你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你应该知道马克思主义通常认为政治上层建筑必须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如果你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么你的政治上层建筑应该适用于这样的经济基础。现在我们来谈谈中国的经济基础，我先给出数据：首先，大家都应该知道，中国的金融资产70%由国有银行控制，而国有银行80%的资本金来自中央政府，这意味着中央政府用全民所有制资产来控制国有银行，意味着绝对比重的金融资产是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的，如果从全球角度来谈金融竞

争，你可能知道现在只剩下一个国家，那就是中国，能拥有这种由国家所有、控制和管理的金融资本，你可以称其为国家主义，或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本，或者国家金融资本主义等等，但是不管叫什么，没有哪个国家有这样的现象，中国是唯一一个，所以这是**第一点——金融资本属于国家。**

第二点，国有银行和其他银行的70%的投资，都投向了国有企业，这意味着国有企业70%的金融资产，都来自国有银行体系，这意味着它们是相互联系相互结合的，彼此交织的，这意味着中国有一个国有的金融体系，还有一个国有企业系统，占比70%。

第三点更重要，中国所有的土地，作为实体资产，属于国家和农村集体所有，中国城市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只要国家没有否认全民所有制，这意味着“国家所有”在逻辑上属于“全民所有”，你们可以质疑，但原则在那，宪法也规定了，全民所有制现在由政府代表，这是宪法赋予的权利。然后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属于村集体，属于村庄，所有这些投资者，这些资本只能租赁农村土地，并不能得到所有权，所以这意味着无论是房地产还是耕地，这些自然资源是属于国家的，而且根据宪法规定，属于全体人民。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一、国家控制着70%的金融资产
 - 二、国有银行70%资金投向国有企业
 - 三、土地归国家和村集体所有
- } 社会主义性质

你应该知道中国的经济基础大体上是社会主义的
you should know that is basically economic infrastructure socialism.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来看，你应该直到中国的经济基础大体上是社会主义的，现在，因为我们有大量的知识分子，他们只能照搬西方中心的社会科学，他们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工具来作出分析，所以这些马院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来不知道什么是经济基础，他们只想研究政治上层建筑，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在，这就是为什么我首先要告诉各位，特别是萨米尔·阿明，这位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我想向你，向我们的俄罗斯朋友，以及其他中国与会者汇报，以理解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谢谢。

亚历山大·布兹加林：大家好，非常感谢，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与如此有趣的同事进行这样的对话的机会非常宝贵。我将从苏联的反面的教训和正面的经验及21世纪社会主义的教训和人类的教训谈起。

即使你们不想用“社会主义”这个词，但有时用什么词语非常重要，在俄罗斯我们有一句谚语，这句话也许其他国家也用，那就是：如果你给船起名字，一定要谨慎，名字意味着船的未来，有时甚至决定船的未来。社会也是如此，在某些方面，名字可能与现象的真实本质相反，有时名字和本质是一致的。苏联的历史经验是这二者兼具，在某些领域，某些空间，某些时期，我们在人类解放，社会公正，实现真正的民主等方面，的确取得了许多成就，得到了积极的成果，而从另一些方面来看，苏联的历史充满了失败和教训，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个领域，异化都在增长，至少我们无法否定异化的存在。

如果从头说起，我会用社会主义这个词来命名自由王国的起源，自由王国这个词出自《资本论》第三卷，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也出现过这个词，在西方，也不仅仅是西方，关于异化的著作也非常重要，这些著作在20世纪60年代非常流行，于此同时，专门研究异化、解放等问题的著作，在苏联大量涌现，克服异化意味着创造人格，创造历史生活的真正主体，文化生活的真正主体，与人对话的真正主体，以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变革的主体，人民不是对象，不是工具，不是手段，而是真正的组织者，是所有这些生活领域的真正创造者，这并不意味着你不会被社会法则所影响，而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些法则来促进发展，我将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来解释，有一条规律是，如果你把重物放在空中，它就会掉下去，这是物理定律，我们如何运用这个定律呢，我们可以造一架飞机，飞机虽然很重，却不会掉下去，虽然有时可能会掉下去，但大多数时候它是可以飞起来的，这打破规律了吗，这违反了物理定律了吗，没有，这是客观事物和可能性的结合，使不可能变成可能，历史也是如此，当你和他人一起创造出在以前的社会生活中不可能，但从客观规律的角度来看却是可能得事情时，自由王国便诞生了，这是一个非常哲学的特征，但却非常重要。

为什么重要，因为无论是国家资本还是私人资本，在许多方面，都是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异化形式，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之间的区别非常重要，但这就是两种不同异化形式的区别，即使国家属于人民，人民真正控制着国家，不是官僚机构，而是普通人民真正控制着国家，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不是完全的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还有其他很多人都说过，未来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国家的沉睡，意味着国家作为政治代理人，作为与人民相异化的代理人的作用的减弱，这一点非常重要，苏联的教训之一就是，如果国家不是真正由普通人控制，如果国家是作为独立的机构运作，它就不会减少异化，也不会真的朝着自由王国迈出步伐，有各种各样异化的例子，不只有古拉格集中营，不只是斯大林时期所有这些镇压，尽管这令人印象深刻，但真正问题不在于此，真正的问题在于苏联人民很多方面都变得非常被动，他们就像等待一个强大的父亲一样，等待着国家为他们处理好一切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的人民饱受压迫，经常处于危机之中，却如此被动的的原因之一，他们仍然寄希望于一个好沙皇，好皇帝，好的共产党总书记，好总统，会来拯救他们，

组织起来，解放他们。解放我们自己的这种思想，在苏联时代的末期，已经与苏联人民渐行渐远了，这是一个反面教材。

苏联有建设性的经验是，在最初的几十年，也许到上世纪60年代为止，我们有真正来自于人民群众的历史的热情和集体性创造。苏联的形成时期，梦幻般的集体主义，热情，新型人际关系，非异化的时期，也是充满了独裁，压迫和受害者的时期，这中间存在着非常深刻的矛盾，所有的新城市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建设的，所有新工业、科学、教育、文化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发展的，那是了不起的飞跃，1924年内战结束时，俄国80%的人不会阅读计算和书写，然而到了1957年时，短短30年的时间，其实只有25年，因为中间有5年战争，在那场及其惨烈的战争后是战后恢复期，短短25年之后，我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我们向宇宙发射了第一课人造卫星，人类首次进入太空，我们制造了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建造了第一座核电站，等等，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果，所以这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跃，是一次真正的文化教育革命，在苏联初期，我们自下而上创造了许多新的文化生活形式，在组织住房，体育，科学，教育形式方面，创造了许多人民自我组织的形式，马卡连科创造了由罪犯少年犯组成的公社，把他们塑造成了了不起的人，从这所学校毕业的近90%的人，都成为了非常著名的工人，艺术家，工程师，科学家等，这是一个真正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学校，这一经验被誉为人类在教育领域做出的最大尝试之一，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趋势，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存在许多压制。

让我们用温教授的风格总结一下 国家的三重角色

一、国家可以成为资本的第一手工具

首先，国有资产并不意味着这是社会主义，这一点我和你（温铁军）有不同看法，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在列宁的著作中，甚至在苏联时期的教科书中，都强调资本主义可以在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对资本主义来说，国有土地甚至更有利可图，因为没有绝对地租（有其他形式的地租，但没有绝对地租），这都是教科书上的内容，是我在经济系一年级就会学到的内容，国有资产并不等于社会主义，不管是中国、俄罗斯还是巴西，国有资产也是资本主义的正常现象，美国就是从共有土地起家的，谁是土地所有者当然非常重要，这决定了不同类型的资本主义，国有土地所有制的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城市中，比私有土地所有制的资本主义更先进，这毋庸置疑，如果土地不是私有的，地租可以归普通人而不是资本家占有，但这仍然不是社会主义机制，而是资本主义内部机制，这也不止是西方的问题，而绝对是一个普遍的特征，国家也是如此，如果国家在工业、教育、文化和医疗保健领域拥有国有资产，关键问题就是这个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国家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同样，通过马克思主义，这是众所周知的，绝对普遍的问题，不论是俄罗斯、中国、印度、巴西还是美国埃及，国家可以成为资本手中的第一工具，国家将实现资本的利益。

在经济危机期间，人民想获得国家的补助时，非常容易看清这个国家到底是为谁的利益服务的，我给你们举几个当代俄罗斯的例子，2008年金融危机时，政府到底该救谁是一个大问题，因为经济和社会形式变得太糟了，经济下跌了10%，政府有两个选择，一个方案是直接帮助教育医疗和工业以提高产量，增加供应和需求，并为经济创造动力，另一个方案是向因债务而面临巨大问题的私营

金融公司提供资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私营金融公司向银行偿还债务，而银行将向工业提供信贷，工业将创造就业机会，工作岗位会带来工资，工资会增加需求，需求会促进经济，然而现实是怎么样呢？在所有这些交易的最初阶段，绝大部分资金就都流向了境外地区，因此首先请审视一下国家到底在做什么，把钱花在了哪里。

二、国家可以成为脱离社会的官僚机构

其次，国家的作用，国家可以作为脱离社会的特殊机构，只为自己工作，这也是绝对普遍的问题，在古代中国、古罗马、俄罗斯帝国和美国的历史中，你都可以找到这一点，现在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这在历史上和社会中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如果国家只为国家机器而工作，只是为了再生产和增加国家的权力，这意味着国家只是一个官僚机构，这是一个非常特有的现象，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但对苏联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训。通常情况下，如果国家是为自己工作，那么下一步就是利益交换，而不是以国家机器的地位来接收资本，这也是苏联的教训，进行利益交换，权力就会变质，权力将被交易为金钱和资本，国家的特权将转变为私人资本，这对官僚机构和权力集团来说更为有利。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国家官僚机构和党的官僚机构异化于普通民众，这种异化是物质利益的，是普遍性的，而非俄罗斯独有，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是一样的。以权钱交换来代替特权和官僚机构接收私人资本，于是乎“私有化”就开始了，一系列所谓的“改革”或者叫反革命就开始了。因此，这是国家第二个重要的身份。

三、国家也可以成为普通人民的真正代表

国家的第三个身份是成为普通人民的真正代表，在这里，我们必须提出基层民主的问题。在苏联，民主不是一个旗号，而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方面，我们有专制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我们也有一些基层民主的元素，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局面，企业党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方面，他们是官僚机构压迫任何反苏活动的工具，即使你想组织罢工来增加工资，也是被禁止的，你会被逮捕，在此之前罢工运动就会被党委控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有一个主任视图压迫没有丈夫，可能有两个或三个孩子的妇女，这个主任就会受到惩罚，而妇女则会受到保护，因此，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制度，有必要仔细研究这套制度，因为它也有很多积极的东西。

苏联的下一个教训，非常重要，这是柳德米拉·布拉夫卡女士的主要论题（我很荣幸能成为这位女士的丈夫），她的主要观点是我们没有在生产关系，政治等领域建立起社会主义，或者说没有建立足够的社会主义，但我们曾经在文化领域有很多，甚至是共产主义的，非异化的集体生活形式，这一点至关重要，文化是社会生活的气息，标志，和十分重要的特征。当你去看一部电影或一出戏剧，或读一本书，或看一场电视节目，或听一首音乐，这都是你个性的创造，于此相反，官僚主义形式，资本主义和市场形式都是异化的，它们不会触动你，它们只是使你娱乐，你去电影院看戏，看电视是为了娱乐，是为了放松，这就是为什么你会把文化当作市场，当作表演，或者当作官僚宣传，这两种形式都是异化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

因此，如果没有触动心灵的文化，那就意味着没有社会主义或自由王国的开始，如果有了文化，并不意味着就有了实现社会主义物质基础，文化是可以先行的，没有文化，就不可能走向自由王国，但是，有可能在文化上朝着自由王国的方向发展，却没有实现自由王国物质的基础。

苏联的下一个教训，我讲完就必须结束了，我的发言时间到了，这个教训就是分配问题。

这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如果人格的主要动机仅仅是获得金钱和物质财富，这就意味着你拥有一些建立自由王国的工具，但这并不是自由王国本身，实现自由王国的工具，和真正的自由王国，这两者是不同的。利用金钱，物质等动机朝这个方向前进是可能得，也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的，**列宁写了一个公式说：仅仅依靠热情和人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须要有金钱、商品和市场的动力，但我也可以把这个公式反过来，没有热情和人文动机是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如果你只有市场，商业动机，那就意味着你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我甚至可以列出一个公式，你越是拥有人文主义的，充满激情的动力，作为真正的生产力增长，效率增长，高效再生产的真正动力，就越是朝着自由王国的方向发展，这种动机越少，你就越不可能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用武力干预现在到处存在的这种商业动力，没用的，而是说，文化发展的方向是至关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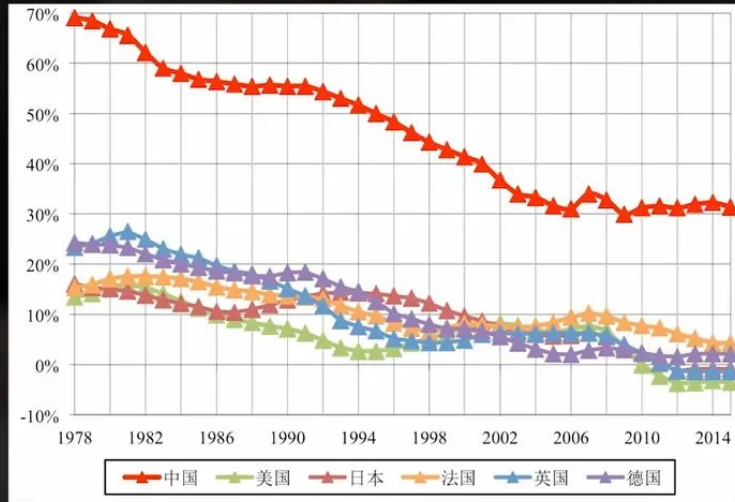
最后的补充说明，中国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市场关系模式，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有很多相似之处，我想强调的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思想，是从带有一些社会主义因素的市场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走向越来越自由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因此，要从这种带有大量资本主义市场异化等因素的混合经济，走向更少异化、更自由、更集体、更人性化的社会经济生活，大方向是非常重要的，你要从哪里出发，要往哪里去？如果没有非异化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形式的增长，就没有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社会是可以曲折发展的，也须是因为地缘政治形式，内部政治矛盾等等，你可能要走回头路，会有这种可能，但是你们必须清楚，我们正在倒退，这不是前进，这是退步，这种情况也许会持续5年10年，但如果你说这不是倒退，我们在向前发展，那么你就会迷失方向，你就会犯战略性错误。走回头路，战术上可以，但战略上不行。

最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长江在中国的地理中是自西向东流向太平洋的，但是在这条主干道上也有很多支流，所以，如果你知道长江从西向东流，你就明白了，现在长江从东向西流了，河流的方向错了，但我们会走向对的方向，我们也许可以修建一条河道来加快发展但是，如果你不知道往什么方向走，你就永远找不到真正解决现实矛盾的办法，这是苏联的教训，你们必须明确发展方向，谢谢。

33:14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萨米尔·阿明

萨米尔·阿明：今天有很多话题可以讨论，都是你们之前建议的话题，我将就一些问题发表我的看法，第一点，铁军坚持认为中国经济基础有三个特征，我当然同意这三个特征的重要性，这些都是在毛时代建立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们还在发挥作用，也许（公有的部分）从100%下降到了70%，但70%也并不算低。

公有财富占国民财富的份额



资料来源：
《不平等的加剧：
私人财产和资本的积累》

直到今天 中国的土地仍然是国有

The land property of the state has been, until today, maintained,

直到今天，中国的土地仍然是国有，不过国有土地现在也受到了威胁。但是，我不会称其为“中国特色”，当然你们怎么命名都可以，我会把它称之为正确的解读，是贯彻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的解读，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和中国人民面临的挑战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形态，所以我不反对这些特征，在毛时代，我会称之为国家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这为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但现在，要认清它到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我们还要看上层建筑，也就是权力体系。

上层建筑可以改变经济基础

控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在毛时代占比接近100%，而到了今天，我估计只有50%了，今天的这个权利体系与毛时代的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上层建筑并不能反映经济基础的需要，它具有广泛的自主权，而且还可以通过这种广泛的自主权，来左右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如果我将毛时代中国的制度定性为国家社会主义，那是因为在一定程度上，但并非完美的程度上，毛时代的权力确实代表了人民，但是也还不够，也就是说，毛时代并没有提供从国家社会主义向经济和社会的社会化管理过度的制度化路径，在毛时代，就已经存在内部矛盾和反对派，中国共产党内部一直有左派和右派。但在邓之后，他后退了一步，但是是在战术上，而不是战略上，至少在邓自己看来没有倒退，我们不应该忘记，邓是个中国共产主义的老革命，他不是个新人。但自1990年以后，现在已经发展出新的所谓中国特色，这被不断重复：这就是中国特色：市场万岁开放万岁。我不认为这些是中国特色，因为在埃及和塞内加尔等买办国家或者其他地方，也都能找到这些特征，这是美国特色，这是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这就是今天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特色。它的来源于重要的国有资产相关，正如俄罗斯的同事所说，苏联有俄罗斯套娃，也就是说，公共财产的外皮下隐藏着私人财产，我想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有很多准私有财产，就隐藏在所谓的公共财产或

集体财产当中，但在中国，这似乎并没有被视为对社会主义的挑战，并没有被视为对中国最终能否走向社会主义的挑战，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

顺便说一下，有人跟我介绍过，我们在阿拉伯语中也遇到了与汉语相同的问题，18世纪阿拉伯语并没有国家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些词是在19世纪末创造出来的，但是通过使用古老的阿拉伯语词根，真正的阿拉伯词根，这些词根可以暗示一些接近的东西，在人们的理解中，它们变得非常清晰易懂，现在我们用“القومية”来表示国家主义，用.....这些都是阿拉伯语词汇，每个人都能准确理解，是的，这些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

布兹加林刚刚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关于现代性的异化，不，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对我来说，现代性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欧洲人发明的，它是在五个世纪前由中国人发明了一半，在两个世纪之后由穆斯林人发明了四分之一，然后才由欧洲人发明了剩下的四分之一，但是欧洲人赋予了它更精细，更好，更强和更完整的形式，这就是说，人类，我用的是“人类”这个词，这个词以前指的是男人，但女人也是人，人类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是人类思想和行动的产物，人类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就是我对现代性的定义，在此之前，历史是由神和祖先创造的。

前现代的异化：神和祖先主宰人类，这就是“传统”，因此之前是没有主体存在的，人类不是主体，人类将自己贬为客体，因此他们被异化了，但他们在什么方面被异化了呢？我认为，也许这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但可以发明个词，叫自然的异化，也就是说，考虑到人类社会像自然一样，是有诸神或事物的本质所支配，而不是由自身所支配，这是一种异化。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中被商业异化所取代。

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市场和资本主宰人类

也就是说，现在市场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市场就意味着资本，因为它是资本主义市场，如果你问一个欧洲失业的工人，你为什么失业？他会回答“因为市场！”市场正在扮演上帝的角色，这就是市场异化。市场异化表现为相互补充的多种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的伪经济学定律、传统经济学，支配着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他们变成了外部力量，就像超自然力量一样，因此个体失去了成为行动者、主体的能力，他也沦为了客体，但这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异化，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异化，与前现代的自然异化相对立。这是第二点。

我想说的第三点是，我坚持上层建筑的重要性，现在，中国的政治力量到底是什么呢？它有相当大的自主权，但它与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越来越紧密联系，而资产阶级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又与全球资本主义紧密联系，并作为外国垄断资本的分包商进行运作，正式这种政治力量，选择用市场和开放来重新定义所谓的中国特色，市场和开放会导致铁军所说的中国的三个特征消失，他们主张金融系统私有化，私有化国有银行，开放中外合资银行，以及外资银行等等，这将夺走中国政府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使投资不再投向国有和半国有企业，而是直接投向私有企业，他们还怂恿中国放弃土地国有，转向小有产者的私有制产权，但大多数小有产者会很快招致失败，形成少数人获益的局面，再造一批地主富农，中外合资农业企业等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金融系统私有化
 资金投向私有企业
 土地私有化

} (市场万岁!开放万岁!)

形成少数人获益的局面

of a large majority of them to the benefit of a minority,

时至今日，与全球南方相比，包括与所谓新兴国家印度或巴西相比，中国都具有巨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在于，到目前为止，尽管中国的土地使用权并不平等，而且越来越不平等，但并没有像其他地方一样，禁止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土地，因此，你在第三世界其他国家看到的是农民从农村向城市贫民窟快速大规模平移，仅此而已，在中国没有这种情况，可能有一点点，但只是一点点，因为中国在20-30年内就完成了3亿人口的城市化，城市化的人口相当于一整个欧洲，中国用30年的时间再造了一个欧洲，这不容易，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没有把农村人口从80%减少到10%，虽已减少到50%以下，但还没有减少到10%，巴西已将农村人口减至不足10%，结果是2/3的巴西城市人口挤在贫民窟里，不是20%，而是2/3。当前所有所谓的新的中国特色所带来的压力，正在摧毁毛时代建立起来的真正的中国特色，这就是当前体制面临的挑战。

人民民主是从国家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关键

从国家社会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与布兹加林刚刚提出的问题有关，那就是创造民主。不是资本主义创造的民主，资本主义创造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而不是人民的民主，如果人民通过斗争，赢得了权利和话语权，但也会受到资本主义逻辑的限制，受到今天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限制。创造民主，这种创造没有神奇的公式，但如果权力系统不开辟通往民主的道路，我认为在毛时代开辟了一些道路，之后就完全没有了，而在列宁之后，在俄罗斯苏联的案例中，更是完全没有，也就是说，人们试图创造它，因此就存在着冲突和矛盾，这个主体地位，是要靠斗争来赢得的，所以对政治上层建筑的强调，我将其称为权力体系的阶级内涵，这是至关重要的。

这是我的初步回应，但我相信还可以说更多，因为你们提出了非常重要的问题。

汪晖：其实我并没准备系统的论点，我接着回应上面几个问题。我认为他们三位已经提出了很多重要的问题，我们和温铁军就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认为这些问题仍然值得讨论，但是我很难给出一个规范的成体系的答案，我从列宁关于1911年革命的论述开始，列宁说他从孙中山那里学到了最重要的一课，就是，为了在落后地区发展农业资本主义，需要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改造，我想他应该是在1912年读完建国大纲后写的这篇文章。

确实，土地国有化不是社会主义的发明，列宁在1907年已经就美国的情况说过同样的话，他说，这种特定形式的土地国有化是发展农业资本主义的前提条件，然而，在1911年革命后，列宁与1912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他认为，为了让这些非西方国家——俄罗斯、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就需要社会主义，并且需要去发展它，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农业资本主义的议题（后来他还用了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被组织成一个政治进程，如果没有这个政治进程，就很难定义其本身的性质，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形成了某种逻辑，即他仍然认为中国需要发展某种资本主义经济，但是，这篇文章中也有一种超越资本主义主流逻辑的逻辑，那就是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的社会主义，特别是对于中国和大多数农业国来说，他们需要一个政治进程，政治文化，那就是发展社会主义，以实现其经济发展，无论怎么定义这个政治进程，是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甚至列宁本人也用过国家资本主义这个词，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偶尔也会用国家资本主义，但后来他越来越不喜欢用这类术语了，但我们都知道他们用过这些词。

这就是为什么在20世纪这个漫长的进程中，无论是在革命进程，还是建设进程中，我们这些后发国家都把“异化”作为目标，因为从一开始，社会主义建设或革命进程就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因为这些国家都是农业国，因此工业化是必要的，国家建设也是必要的，因此，确定社会主义的性质，需要从一个长期的政治过程开始，一方面看你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了一些建设项目，但另一方面要看你是否有来自内部的反资本主义过程，从列宁和毛泽东的辩证思维来看，没有后者，就很难实现社会主义。

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应该思考在20世纪文化的重要性，从“五四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文化作为一个范畴，一方空间，作为一种创造新的社会生活形式的力量，是极其重要的，因此，社会主义文化或任何一种进步文化，作为一种范畴成为了创造新事物的空间，新事物由此而生，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们跟西欧的情况不一样，就像温铁军开头所说那样，资本主义进程并不是直接来自我们自己的社会，虽然中国有市场经济体系，也有萨米尔说的更早的发展阶段，但这种19世纪类型的工业体系只来自于西方，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需要相互交流，文化问题变得非常重要，所以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在这些历史条件下的关系，这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认为所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它所论证的上层建筑或其反作用的重要性，这仍然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认识到了它的重要性，例如在《费尔巴哈提纲》中，马克思就提到过这一点，还有恩格斯和20世纪30年代战争时期的毛泽东也说过，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有时在这个过程中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因

此，在20世纪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或创造中，政治文化，社会主义制度至关重要，这是我的一个多少有些主观的看法。

于此同时，从社会主义本身的历史来看，它确实创造了新的生产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比如说，不仅创造了公有制经济和再分配方式，甚至生产形式也发生了变革，比如说人民公社就是其中之一，如何评价人民公社，那是另一个话题，但人民公社是生产组织形式的创新，它不是传统的生产形式，当然，人民公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但它是一个历史性的发明，还有单位制，工厂、大学、甚至政府医院等等，都是单位制，单位这种社会形式试图进入经济和其他社会形式，不让生产成为整个社会的主导力量，而是试图将生产社会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单位内部的社会关系，与纯生产单位，比如现在的公司、工厂等等，有着根本的不同，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工人农民或干部在这些单位中的地位及其社会关系，与现在这些工厂有着本质区别，他们不是雇佣工人，这些单位的工人不是雇佣劳动者，农民也不是旧式的农民，诚然这些形式在某些时候失败了，现在我们发现它们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整个20世纪的创造过程，不仅在中国，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但在中国，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治进程，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像毛泽东思想这样的理论，不仅如此，就连国家军队的组织和形式也是不同的，我们知道这场斗争，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军队之间存在斗争，在中国和苏联军队之间也存在斗争，前几天我们谈到了这一点，尤其是在50年代之后，军队体制的改革，朝着军队内部的平等主义制度发展，所以不同种类的单位，包括军队，所有这些国家机器，虽然仍然采取国家的形式，但是由于这个漫长的社会主义进程，他们已经有了一些不同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发现，从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后会出现如此根本性的巨变，在某种程度上，一方面我们认为我们仍然拥有社会主义的遗产，正如萨米尔所说，中国在这方面仍具有强大的优势，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感到沮丧，因为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力量。

我认为这个过程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失败了，建立在工人国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崩溃了，我们应该认识到这是历史性的失败，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不复存在，而是这种类型的国家形态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资本支配着各个领域。

其次我觉得更严重的是，20世纪的政治文化进程，为了创造一些从根本上与受制于资本逻辑不同的机制，所有这些不同形式的创造，诸如人民公社，或单位，或军队，还有人民法院等等，所有这些为了防止资本主义逻辑统治一切而创造的产物，现在它们都变了样，事实上，这个文化过程几乎完成，但还没有完全完成，我们仍然可以在国家结构内部和社会内部发现一些阻力，你仍然可以发现，对于这种巨变，到处都存在着抵制，但这种抵制的势头已经基本上消失不见了。

另外我们需要讨论的是20世纪的一些特点，即阶级范畴和阶级斗争在20世纪的重要性。但基本上阶级这种政治范畴，现在在大学系统中，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门学科，都是由美国社会科学主导的，这些学科都只做社会分层的划分，而回避政治范畴的划分，当然，即使是左翼内部，也存在是否有必要讨论阶级问题，重启阶级分析的争论，但无论如何，阶级分析一直在继续。

最后一点，我想说的是，权力问题主要是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问题，我完全同意这一点。我们需要的是发明一种新的民主形式，制度开放的民主，但现在关于民主化的争论只聚焦在应该是一党还是多党的问题上，这些对于政治制度的分析只是形式主义的，但据我观察，权力结果的巨大转变，正在从所谓的“党-国”体制向“国-党”体制转变，这意味着政治组织与国家职能的完全融合，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讨论如何建立这种关系，是对整个体制开放，还是重新组织另一种形式的国家政党，这就是教训，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政党的角色，当然，政党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仍然是极其重要的，正如萨米尔前几天提到的，埃及的农民为组建自己的政党而斗争，但问题不仅仅是政党如何向社会开放，而在于整个政治结构如何向社会开放，因为如果政党已经完全融入了权力结构，这意味着不仅仅是党的开放，而是整个社会政治体系，权力体系的开放，如何找到一种向社会开放的形式，因此，在这场巨大变革的背景下，重新提出社会主义议题仍然很重要，它关系到发展方向，关系到我们是否还有克服异化的逻辑，以上是我的基本论点。

01:07:60温铁军补充

温铁军：我想我可以给你们提供更多信息，帮助你们进行分析。因为我不是意识形态或政治问题方面的专家，我只能进行经济方面的分析，所以我会给你们更多的资料，供你们来做分析。

我一开始就说了，不论什么“主义”什么“化”都是中国文化的固有概念，我会尝试使用一些概念，诸如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反正不管什么主义吧，你们可以随使用什么名字来定义，我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些思考的材料。

当我们现在谈论危机的时候，大多数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等，都陷入了全球危机的陷阱，有些人以中国为例，说中国仍有超过7%的GDP增长，然后，他们认为中国是使全球经济保持增长的唯一源泉，但如今，中国也面临诸多挑战，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挑战，中国应该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挑战？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资本主义，中国只是照搬其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呢？还是说中国有什么不同经验，不管它是社会主义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国家主义也好。总之，你们很容易看到，中国的很多做法都与发达国家大相径庭。

首先，大家可能知道，就像其他工业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在1998年也发生过类似的生产过剩问题，一是当时发生了亚洲金融风暴，海外需求大幅下降，然后，中国在90年代末就发生了以生产过剩为主要表现的危机，然后中国把这么大的工业过剩产能变成了什么呢？如果中国跟着资本主义国家走，一定会有大麻烦，因为你的工业产能太大了，那怎么办呢？所以，当你们讨论目标，讨论方向的时候，首先要清楚，中国有着如此巨大的过剩产能，那么这些过剩产能该往哪里去呢？在欧洲，当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发动了战争，数百万人死亡，而中国将这些巨大的工业产能转化为区域差距的再平衡，中国制定了再平衡的战略，向中国西部、东北和中部投资，这个再平衡战略的总投资额，接近1.2万亿美元，中国把这些大量的过剩产能投入到了西部建设中，在这个区域再平衡战略之后，第二个战略是新农村建设，中国在农村建设上又投资了1.2万亿美元，然后让几乎99%的村庄通了路、电、水、电话、甚至互联网，做到了五通进

村，所以我们说，如果你把中国作为一个市场体系来谈，就会很容易理解，你投资到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农村没有电，没有路，没有水等问题，农村缺少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但是当你这么干的时候，你能从农民，从农村那得到回报吗？不可能，所以这不是市场的逻辑。因此，如果你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你找不到其他国家可以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投资。

（萨米尔发言：这不是市场的逻辑，我同意你的观点，但那些人所谓的中国应该继续改革等等，是朝向市场的逻辑）

这是意识形态问题，但事实上（萨米尔：这是政治问题）

所以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不是说政治问题的专家，我只是给你们提供一些材料和数据，让你们明白中国的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你们读了很多展示这些意识形态宣传的报纸和文件，但我只做经济研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给你们一些数据，现在，如果你做比较研究，没有一个国家能像中国一样让通信进入农村，99%的农村都能铺上路面，通电通水。很多农民都享受到了这样的基础设施建设，此外，这些巨额投资的一半会投入到当地的医院、学校，让后帮助当地人民建立社保，现在98%的农民，你知道我们有9亿农民，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农民，而中国的社保可以覆盖98%的农民人口，这在任何其他发展中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的，你能想象美国能给98%的老百姓提供医疗保障吗？但在中国农村，覆盖了98%，整个医疗系统以村为单位，而不是以农户为单位，中国有村集体对吧，村集体出这笔钱，政府补贴80%，因此，村集体只需支付20%，就能覆盖所有村民的医疗保障，因此，中国政府建立了这个社保体系，几乎覆盖了所有人，这些事情大部分都没有被中国媒体报道过

（萨米尔：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报道呢？温：因为那帮人都相信市场，相信全球化，他们都是专家。萨米尔：他们想让中国越来越市场化，全球化。温：的确如此，但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也只能提供一点数据，说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具有某些社会主义特征，这些特征是中国特色还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但无论如何，这些特征很重要

通过这些重要的数据，我们知道这些事对老百姓非常有用，使广大群众获得了好处，这就是我想说的。

01:17:05萨米尔发言

在西方国家，人们问我，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吗？我回答他们：不是的。它是一个国家，但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我不知道社会主义对你们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中国也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国家，漫长的转型，中国可能朝着社会主义发展，但也可能朝着向资本主义发展，无论你刚刚说了什么，虽然那些都是事实，但政府的意图，至少是官方一再强调的意图是：政府将继续推进所谓的改革，深入市场化，扩大开放，这将逐渐破坏使中国真正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

话虽如此，我还是要对未来作如下展望，假设中国经济继续发展下去，使中国的人均GDP能和美国西欧的人均GDP持平，中国可以成为一个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人口众多非常强大，安德烈·

冈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提出，我们正在进入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资本主义的重心从大西洋转移到东亚，中国将成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不幸的是，我认为这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不仅是统治阶级，统治权力的梦想，他们都坚信这种可能性，也可能是许多普通中国老百姓的梦想，尤其是大多数新中产阶级，也可能是其他人，毕竟，中国和埃及都具有悠久的历史，千百年来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成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头号强国呢，如果真能实现这个梦想的话，那么我会说共产党将变成一个成功的国民党，因为这就是国民党曾经的梦想，但我要指出，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跟安德烈的分歧就在这儿，我认为中国不可能沿着资本主义的老路发展，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们厌恶资本主义，因为如果这个梦想有可能实现的话，那么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它，在人们看来，我们所有的发言都是无用的空想家的胡说八道，我们只是空想家，是没用的废物，如果这个梦想有可能实现的话，我们现在就是逆历史潮流而行，但我认为这个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它之所以不可能实现，是因为全球体系的控制力量不允许中国走到那一步，毕竟这是由谁来着，克林顿签署的文件，他说，我们必须设想一场可能得针对中国的战争，上面的数字写着，要消灭中国6亿人口，如果有必要的话，这在美国的战略考虑范围之内，美国人所能容忍的是中国成为边缘国家中的头号分包商，美国的劳工阶级在哪里？在中国，这就是他们眼中的中国的未来。

我不了解那些在中国国家首脑办公室工作的人，但我的感觉是，他们可能会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可以长期共存，要我说这是一场长期斗争而不是长期共存。他们可能还抱有幻想，只要我们中国不过多地干涉别国的事务等等，那么西方国家就会容忍我们赶上来，但是赶超西方是不可能的，因此，中国向右转的趋势非常明显，我这么说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赶超西方，而是因为这是对中国继续朝着社会主义发展的这种可能性的破坏，如果中国越来越接近社会主义，那么它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非常强大的影响。我认为，统治阶级的政治选择和意识形态选择，即使你这样称呼它们，也是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我们不应该只关注经济基础。

01:24:02 亚历山大补充

首先，非常感谢你们的精彩讨论，我同意萨米尔·阿明的观点，但我想强调的是，**如果中国失去了某些元素，比方说一些非资本主义形式，或者甚至可以说是中国现在拥有的后资本主义形式，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下降的内在原因，进而中国可能会因此走向危机，这就是后苏联俄罗斯的故事，这个故事非常重要，问题不仅在于美国和欧盟资本的主导地位，及跨国公司作为主要角色等等，尤其是金融机构扮演的重要角色，问题在于中国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它结合了资本主义和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形式，这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很有趣，而且在某些方面很不寻常，但也仅仅是在某些方面不寻常，我一直在思考这些形式，而我想强调的是，中国目前仍然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元素，但这不是具体的“中国特色”，我这么说不是说我对中国文化有负面看法，恰恰相反，你们正在做普世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你们现在是这些社会主义要素的资本，因此，当你们说“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时，这意味着在俄国不可能复制这些特色，它们只能在中国存在，但我不这么认为，你们现在是我们的榜样，也是许多其他国家的榜样，这就是为什么从我们的利益**

角度来说，这些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具有普适性的特色，值得其他国家学习，特别是对非发达国家或半边缘国家来说，这是第一点。

除了简单的资本主义关系，我们在现实中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认为必须强调的是，在经济领域，如果你看一下经济调控，中国不仅有市场，还有强有力的国家计划，这一点非常重要，有选择性的规定，强有力的产业政策，政府的计划、项目、对高科技技术的支持，针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不同税收制度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中心国家同样有这种模式，比如在一些北欧国家，这种模式非常重要，而且具有普世性，我认为，你们越是发展这一点，不是简单增加而是发展这一点，就很好。

你（温铁军）提到的第二种非常重要的形式是国家投资，也可以说是更普遍的社会投资，用于发簪基础设施，高科技，教育，科学和医疗卫生，中国同事多次提到这一点，这确实是非常大的成就，如果失去了这一点，就会对经济增长特别是发展造成非常不利的后果，在很多领域这些国有投资是国有资产，我同意国有资产往住意味着超级私有资产，国有资产的利益不仅归国家所有，不仅归人民所有，而且归官僚和大资本所有，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认为在中国，在许多方面，国有资产仍然是为整个国家的共同利益服务的，这部分源于旧式封建主义，中国之前就是一个国家整体，但这一点也很重要，它不是资本主义，它也不是简单的旧式封建主义或晚期封建主义，这是作为一个国家应该保护每个人的要素，这很重要，对俄罗斯来说控制金融同样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和问号。

还有一个更值得质疑的问题，每个人的收都在增长但增长却如此不平等，这很难证明我们是在进步，还是证明我们处于后资本主义抑或是纯粹的资本主义，我认为这是正常的资本主义结果的可能性更大，因为资本主义在发展进步的时候，也会给德国英国或美国的公民带来收入增长，因此收入的普遍增长并不能证明我们是社会主义，但这是可以证明中国取得进步的重要因素，温教授刚刚提到，中国农村现在不仅有社保而其在很多方面还在继续发展，这也是中国成就的重要体现。

一般来说，对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以找到相对简单的衡量标准，我只用了经济领域，但这是一个简单的衡量模型，首先，如果政府有更多的监管、规划，更少的自发式的市场发展，再加上更少的垄断性巨型公司对人民的控制，那么你就越有社会主义的要素，真正的社会财产越多（这些财产是否国家所有并不重要）社会主义要素就越多，它可以是农业的集体财产，也可以是市政财产，可以是每个人在互联网、文化或教育领域的一切财产，因此财产归属的社会本质，不是形式，而是本质，也是衡量后资本主义发展的标准。然后是衡量平等的标准，衡量标准很简单，但却非常重要。衡量一下保障人类发展，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方面的免费基本制度就行了，所以这很容易计算，甚至可以通过统计数据来衡量。

最后是发展的问题，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两者有区别也是众所周知的，有不同的形式对发展进行评估，比如人的潜能系数。政策和政治领域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我提到过，保护所有国家免受帝国主义压迫不是社会主义的要素，但也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的要素，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有必要进行更仔细的研究。最后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我完全不是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的专家，但至少从外部可以看出，中国有一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元素，至少在官方层面上是这样，也许这不是很重要，

但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不是0，也许它的现状不是很好，不是很受欢迎，但它是有价值的。还有一些其他的形式，许多普通人仍然与一些社会主义价值观有着积极的关系，也许是在口头上，但至少是在口头上存在，这也很重要。最后是文化中的一些元素，我只看过几次你们的电视，但当电影讲述你们的革命历史，讲述你们的辉煌胜利，讲述中国人民在不同领域的真正英雄行为时，这种文化气息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人们不是为了自己的财产，不是为了自己的金钱，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甚至不是为了自己的小家而战，他们是在为伟大的价值观而战，电视上还在讨论这些议题，而这在美国甚至西欧的电视频道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比，这只是一些小的因素，但却是重要的因素，我想强调这一点。

我还想强调与所谓的中国特色相关的重要方面，说来好笑，俄罗斯也强调了同样的特色，也就是“俄罗斯特色”，因此我只想提及其中一些，也许阿拉伯世界也是如此，请仔细听，尊重家庭、长辈、父亲和母亲、祖父和祖母、传统等等，这是纯粹的父权模式，高加索、中国、阿拉伯世界、俄罗斯周边的一些村庄等，都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在某些方面日本可能也是这样，我认为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也会有很多这样的形式，这是父权制生活的一部分，是父权制生活的普遍特征。然后是国家主义，这绝对是许多国家晚期封建主义的普遍特征，俄罗斯也是如此，沙皇、国家、领土、文化、国家贯穿了历史，国家意味着一切，历史就是文化、沙皇、宗教、社会、民族等一切，这就是国家，国家是象征，沙皇是国家的象征，这与许多中国特色和阿拉伯特色非常相似。如果一个国家有五六百年七百年封建帝国晚期，你就会把它作为民族传统，或中华文明、俄罗斯文明、阿拉伯文明等的具体特征，因此，对此要慎重，我认为这不能叫某种“特色”。

最后，我想重复两个问题，因为我以为这非常重要，有时必须使用非社会主义手段，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走回头路，而不能前进，很多时候得曲折发展，不得不倒退而不是进步，但是学者、高层领导人都应当重视，甚至对于信息的真实传播，我不能说是宣传，说实话，当列宁说我们要推行新的经济政策时，他说是的，这不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必须学会如何制造市场，但这是危险的，市场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必须学会利用它，但这是危险的，我将再次重申我在大会期间和在中国多次说过的话，邓小平说，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而我强调了很多次，市场可不是猫，市场是老虎，这只老虎不吃老鼠，而是吞噬那些试图利用它的人的人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小心谨慎。谨记市场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中立的工具，它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你们正在使用，我们正在使用，或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使用的所谓市场，其实是晚期封建主义，如果你使用晚期封建主义，他们就会打败你，对于这种工具，对于这种手段，必须非常小心，就像对付老虎一样，最终谁会打败谁，这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关键问题，对中国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当你说富人和寡头是最好的共产主义者时，我认为这大错特错了，你或许可以说没有大资本，我们就无法建设高效的中国经济，或许如此吧，但他们绝对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参与者。


如果你能把市场作为一种工具来控制，就像驯马戏团的老虎一样，那就没问题，但如果老虎不在马戏团，不是你喂它，而是它吃你，这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这也是最终的答案。为什么资本主义的发展能够帮助中国取得如此快的增长速度，没错，这是必要的手段，但现在，我认

为中国正站在边界线上，工具可以成为目的，手段可以成为目的，工具可以成为主宰，资本主义形式和资本本身可以成为主导力量，这将破坏某些进步因素，乃至摧毁整个国家。

对于私人资本来说，让全球经济向跨国公司开放更加合适，他们的目标将不再是把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来发展，所以根本不需要在乎普通人的死活，但作为一个国家，他们的目标将是在世界市场上发展跨国公司，只要为了跨国公司的发展而摧毁中国这个国家是有利可图的，那么不论在哪，他们都会这么做。

01:38:45萨米尔发言

今天早上我给了健芝一篇论文，稍后我会把它复印出来，在这篇论文中我区分了两种增长模式，我现在是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发言。

国仁全球大学堂 

两种增长模式

增长模式一：“可接受的”不平等

增长模式二：造成贫困化的不平等

但少数人获得了大部分的增长和收益

minority get most of the growth, of the benefits,

第一种增长模式会让铁军非常高兴，我则喜忧参半，第二种增长模式则会让我们所有人都无法接受。

第一种增长模式是经济平均来看是增长的，但分配不均现象日益严重，少数人的财富增长速度要快得多，而大多数人即人民的财富增速较慢，但仍为正增长，这就是我所说的可接受的不平等模型。对我来说，这个模型也是不能接受的，但很多人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大家的财富都在增长，没有人财富缩水，这种模式没有造成贫穷化，而是减少了贫困，这就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模式。而在毛泽东时代少数人并不能占有更多财富，因此人民占有的更多一些，这就是第一种模式。

第二种模式，经济同样在增长，但少数人获得了大部分的增长和收益，而大多数人则停滞不前甚至下降，这是一种造成贫穷化的不平等模式，而不是减少贫困的模式，这就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模式，进入新垄断资本阶段以来，它们距离第一种模式越来越远，这就是1975年以来欧洲和美国正

在发生的事情，这不是过去五年，而是过去45-50年里所发生的，这一点很重要，这也是南方国家的发展模式，至少从19世纪以来它就一直是南方的发展模式，并且还将继续如此发展下去，而这正是令人无法接受的，这就是为什么南方是爆发革命的地区，毛泽东说得对，因为这个体系不可能是合法的和可接受的。南方也可以采取其他发展模式，无论是1975年危机之前的欧洲模式，还是迄今为止的中国模式，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你们可以用真实的数据来绘制这个图，我已经用真实的数据做过了，现在这个是漫画版，我发现基尼系数在所有情况下都呈恶化的趋势，而且差不多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以10年为尺度来观测一个国家，基尼系数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孤立地看基尼系数，把它与收入再分配的内容分离，它就失去了价值。

01:43:15汪晖补充

(写这段话后超过2万字限制了，并且意义不大，先省略了)